



翻 译 家

耿濟之



人民文学出版社



翻 译 家

耿濟之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家耿济之/徐伟志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02-010560-1

I. ①翻… II. ①徐… III. ①耿济之(1899~1947)—传记 IV. ①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0273号

责任编辑 张福生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72千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6.875 插页30

版 次 2016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560-1

定 价 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耿济之 (1899—1947)

目 录

耿济之传略.....	徐伟志 1
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1947年4月5日)	郑振铎 41
祭——悼耿济之先生(1947年4月4日)	袁 鹰 47
悼耿济之先生(1947年4月5日)	司马寇 48
耿济之先生传(1947年4月15日)	郑振铎 50
悼念耿济之先生(1947年4月15日)	范 泉 54
从《艺术论》说起(1947年4月21日)	郑振铎 57
耿济之先生遗稿(序)(1947年5月1日)	郑振铎 60
耿济之先生与俄国文学(1947年4月6日)	戈宝权 61
零星的说些(1947年5月1日)	叶圣陶 72
忆耿济之先生(1947年5月1日)	徐调孚 74
悼济之先生(1947年5月1日)	周予同 78
记耿济之(1947年5月1日)	赵景深 81
你闭上你的眼睛吧(1947年5月1日)	许 杰 85
追怀济之(1947年7月15日)	王统照 89
耿济之和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 (1947年12月25日)	王统照 98
关于耿济之逝世的报道(1947年3月4日至 4月6日)	《大公报》、《文汇报》、《时代日报》 102
访耿济之夫人(1947年3月6日)	陈霞飞 105
悼念耿济之(1947年3月27日)	罗果夫 108

回忆“孤岛”时期的耿济之(1980年3月30日)	钱福芝	110
怀念耿济之在“孤岛”的上海(1980年4月13日) ...	赵家璧	123
忆耿济之先生(1982年8月)	戈宝权	136
耿济之的青少年时代(1982年8月)	耿洁之	145
耿济之的遗译(1982年2月8日)	赵景深	155
寄语长兄耿济之(1982年5月18日)	耿馨之	157
翻译大家耿济之(1985年6月27日)	应国靖	160
斯人未憔悴(1985年7月5日)	王 征	162
译林前辈耿济之(2002年2月5日)	陈梦熊 董德兴	165
耿译俄国文学丛书的前世与今世(2014年2月24日) ...	赵修慧	177

附录

耿济之生平译著年表	耿辰、徐伟志辑	184
我的父亲耿济之(代后记)	耿 辰	213

耿济之传略

徐伟志

耿济之(1899—1947),中国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和研究家。早年曾与瞿秋白、郑振铎等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参加“五四”运动,并编辑出版《新社会》《人道》等刊物,探索中国走向新生活的道路。1920年,他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十二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对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国际歌》最早的中译本《赤色的诗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也是由耿济之、郑振铎以诗歌形式首次介绍到中国来的。

他一生译著颇丰,且多为长篇巨著,如托尔斯泰的《复活》、《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与郑振铎合译)、《艺术论》,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父与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死屋手记》《少年》《罪与罚》,高尔基的《俄罗斯浪游散记》《家事》《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还有俄国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婚事》,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安德列耶夫的《人的一生》,都是由他最早译介的。

据不完全统计,从1918年他的第一篇译文《克莱采奏鸣曲》(托尔斯泰著)问世,到他1947年逝世,在长达三十年时间里,他翻译的包括小说、剧本、传记、评论在内的俄国文学作品达一百余部,七八百万字之多,其中长篇译著十几部,可谓卷帙浩繁。

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先生评价耿济之是“我国最早和最著名的一位俄国文学的研究者和介绍者,同时也是一位工作时间最久,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为严肃的俄国文学翻译家”。

著名文学家郑振铎先生曾赞誉耿济之是“中国从俄文直接翻译俄国文学的第一人。他的翻译的艺术很好;虽非绝对的直译,却与原文非常的贴合,并且能把原文的精神充分地表达出来”。

2006年俄罗斯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拉斯普京在回顾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历史时说:“中国人真正‘阅读俄罗斯’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我们要记住两位最早也是最杰出‘阅读俄罗斯’的中国人——瞿秋白和耿济之。”

耿济之秉性温良,质朴谦和,勤奋博学,文章雄劲。他早年提倡“为人生的艺术”,而他的人生,全部献给了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四十九岁。耿济之的一生,为中国的翻译事业耗尽心血,也为后人留下丰厚的文化财富。

一 耿济之家世

耿济之的父亲耿梦遽,上海县人,出身于中医儿科世家。全家一共九个孩子,二男七女,耿梦遽排行老九,是全家最小的孩子。耿梦遽没有承袭祖业,资料记载,他曾前往日本留学。

耿梦遽在日本留学时,正值日本经历明治维新之后,完成了两次工业革命,开始推行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1894年中日爆发海战,1895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和澎湖。惨痛的失败,屈辱的割让,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让每一个中国人为之悲愤。作为一名在日本求学的中国留学生,耿梦遽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可以想见。

耿梦遽是那个动荡时代的小人物，一生没做过什么大事。1913年至1915年间，他曾在北京国立蒙藏学校当过教授国文的老师，这段工作经历，仅仅两年光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被辞退。第二年，也就是1916年，耿梦遽又找到一份工作，在英文《京报》当中文主笔（编辑）。英文《京报》由陈友仁创办于1914年，名为《Peking Gazette》，经常发表与政府不同的意见。1917年5月19日，陈友仁因发表批评段祺瑞的文章《出卖中国》以妨碍公务罪被捕入狱四个月，报纸也被查封。耿梦遽仅仅工作了一年，便又失业了。

此后，耿梦遽一直失业在家，再没有外出工作过。那一年，他大约四十岁左右，直到1948年去世，整整三十年，他在生活上基本依赖儿子耿济之的收入。

耿梦遽在那个时代也算有眼光的人，身为一个上海本地人，从繁荣的商业城市上海，千里迢迢到北京（当时叫北平）找工作，最后将全家人在北京安居下来，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事。正是由于当年耿梦遽携家北上，使青少年时代的耿济之开阔了眼界，经历了风雨，在中国的政治中心，直接感受清王朝的覆灭，中华民国的兴起，以及“五四”运动一系列的政治风云，吸收来自欧美、苏俄的进步思想，跻身于中国知识分子探索社会进步的大潮中。这样特殊的环境，对于耿济之树立自己的世界观，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成就自己的事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耿梦遽不太成功的工作经历，却铺就了耿济之不同寻常的人生之路。

耿济之的母亲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女人。在耿梦遽失业、一家人生计没有着落的时候，她带着大女儿耿洁之，勇敢地承担起养活家人的重担，靠编织毛衣，兼职小学生手工课的收入，维持着全家两个大人、六个孩子的生活！她用勤劳灵巧的双手，坚忍的意志，苦苦支撑着这个家，供养她闲居在家的丈夫，供养孩子上学念书。

然而，她竟然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只知道，老太太叫“耿殷氏”。

耿济之是耿梦遽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农历戊戌年十二月初九，按照阳历，应为1899年1月20日。其实，他姓耿名匡，字孟邕，“济之”是他的笔名，由于经常发表文章，笔名比真名用得更多，人们渐渐习惯称他“耿济之”，连家人也这样称呼他，耿匡的名字，反倒不用了，甚至许多熟悉他的读者，并不知道他还有一个这样的真实姓名。

耿济之出生的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风雨飘摇的年代，晚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一系列外患。1898年，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紧接着，其他列强也来趁火打劫，俄国强占旅顺和大连，英国接替日本占领威海卫，法国则向中国提出“租借”广州湾，中国面临着被分割、被侵占的殖民地化的危难处境，一度貌似强盛的大清帝国，已无力挽救颓势，一步步走向崩溃边缘，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摇摇欲坠。

同年，中国发生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史称“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通过光绪皇帝推行的百日维新，被慈禧太后发动的政变扼杀，光绪皇帝被囚禁，康、梁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六人被押解菜市口问斩，中国走向君主宪政的路戛然而止。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者，扼杀了中国与世界民主潮流对接的愿望，放弃政治改革的道路，中国主张民主宪政的正义力量遭到强权的镇压。从那个肃杀的秋天开始，封建顽固势力的权威代表者——慈禧太后开始实行“垂帘听政”。

耿梦遽为儿子取名“匡”，不知是否带有“匡扶正义”的含义，那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无不愤世嫉俗，抱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

尚在母亲怀抱中的耿济之，自幼多病，经常发烧，耿母甚至发愁，这个孱弱的男孩恐怕难以存活下去。一天，耿母抱着他到上海

城隍庙去算命。算命先生说：你这个儿子可命大，将来你得靠他成家立业。听到这话，耿母哭了，心想，孩子才三个月，哪年哪月才能把他抚养大呀，真是前途渺茫。

不管怎样，算命先生的话，还是让耿母看到了生活的希望，自此以后，她对这个孩子格外精心、格外恩宠。之后，她相继生了四个男孩、三个女孩，加上老大一共八个孩子，但始终对老大耿济之关爱有加，视为终身依靠，一心要培养他成才。

耿母认识不少字，手也很巧，能编织各种毛衣毛裤。还会用钩针打出很多花样的帽子和鞋袜。耿济之四岁时，耿母就开始教他识字，每天教他的字到晚上都能默写出来。他一边认字，一边描红，学得很认真。耿母教儿子念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五岁时便送到小学堂念书。

耿济之学习刻苦，每天下学回家仍要念书，从来不去玩，即使生病，发高烧躺在床上，也不停地念书，考试总是第一名，一直念到初小四年。刚要上高小，他得了一场大病，身体越发瘦弱不堪，出去看病都要耿母抱着或背着，这一病，一直病到十三岁。

耿济之十三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一场大火，烧毁了整个家，全家人无处安身。迫不得已，1912年初夏，耿母带着几个孩子，各自拿着一小包衣服，搭上了北上的轮船，那一年，耿济之十三岁，身体虚弱的他，差点没死在船上。谁知到了北京，耿济之的身体居然渐渐好起来，小学没毕业就考上了北京市公立第一中学（当时叫京师公立第一中学），期末考试名列第一，耿母高兴得哭了。

耿家来到北京后，耿父在蒙藏学校教国文，家境尚可，住在北京东城万宝盖胡同（现名宝盖胡同）的一个院落里。两年后，耿父失业，家中生活无着，有时，全家人一天只能吃上一顿玉米面糊糊。于是，耿母带着大女儿到东安市场接了一些编织毛衣、蕾丝边的活

计,勉强维持生活,供养耿济之读书。

耿济之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仅用了三年,便取得了北京市公立第一中学四年级的毕业证书,以优异成绩考入俄文专修馆。

二 跻身“五四”大潮

1917年夏,时年十八岁的耿济之,进入民国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就读。俄文专修馆,原为“东省铁路俄文学堂”,由清政府创办于1899年,用于培养俄文人才,以备中俄合办东省铁路之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改组为“外交部俄文专修馆”,直属北洋政府外交部管辖,目的是培养外交人才。据当时校章规定,毕业考试名列第一者,留外交部任用,其余由国务院呈请分发东北、西北各边省任用。

俄文专修馆位于北京东城东总布胡同(也有说北总布胡同),当年,耿济之家住万宝盖胡同,与北总布胡同紧挨着,一个烧饼吃不完就到了。耿济之选择就读于此,一是离家近,二是免学费,三是西学东渐,中国需要大量外语人才,将来找工作不成问题。这其中,免学费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耿济之家境窘困,根本交不起学膳费,只能选择这样的免费学校。

俄文专修馆的课程设置,涵盖面广,针对性强,十分注重实践应用。除了俄文、汉文两门主科外,还设置了数学、史地、经济学、财政学、国际法、行政法、民法、刑法、法学通论、约章、体操科目等。俄文专业课中,又涉及汉译俄、俄译汉、外交公牍、俄文史地、文学史、约章、会话等课程。

学校每周六天上课,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除中午吃饭一个小时,其余时间全部有课,星期天也不例外,还要加半天写作课,并且每周公布一次成绩。每天早晨,校长亲率学生诵读《耻字歌》:

嗟嗟此耻我心伤，我心不死何日忘，我心未死当求立，求所以立在自强！

这样的学习环境，激励着耿济之，也激发着他的学习热情，他对俄文专业的喜爱和痴迷，使他的俄文专业成绩出类拔萃，大大强于一般同学，最终以终考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成为俄专学生中的佼佼者。在俄专期间，他开始接触各种新思想、新文化，与同学们一起思考人生，思考社会，探寻改造中国的济世良方。

与他产生共鸣的同学中，有一个朝夕相处、亲如手足的朋友，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文学家、评论家、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这个人的名字叫瞿秋白。

耿济之与瞿秋白，生于同年同月，即公历 1899 年 1 月，两人生日相差九天，耿济之是 20 日，瞿秋白是 29 日。如果按照农历，则是戊戌年腊月出生。虽然年龄相差只有几天，但两个人的性格却各不相同。

耿济之性格内向，脾气温和，平时不爱说话，从来不和别人理论，更别说争辩什么。瞿秋白则性格豪爽，为人热情，擅于思考，敏于思辨，天生具有领袖气质。这样两个性情不同的人，却有着共同的志向、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思想追求。在俄专同窗共读的岁月里，他们一起学习知识，一起探讨文学，探索社会与人生，一起翻译出版文学著作，出版进步刊物，一起投身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当时瞿秋白住的地方窄小，不方便，而耿家距离学校近，每天放学后，瞿秋白总是与耿济之一道回家，在耿家做功课，身上的校服破了，也会脱下来让耿母或耿家大妹妹缝补一下。经常来耿家的同学中，还有郑振铎和许地山，他们几个人，相识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

青年会图书馆坐落于北京东单北大街，是青年会针对当时北

京青年学生的需求开办的,免费开放阅读和研讨。图书馆里有七八个玻璃橱的书,其中多为社会学的书,及俄国文学名著的英译本,如契诃夫的戏剧集和短篇小说集、安德列耶夫的戏剧集、托尔斯泰小说等。这间小图书馆,极大地吸引了耿济之、瞿秋白这些青年学生,在这里,他们阅读各种来自国外的书籍,结识思想进步的新朋友,一起探讨人生与社会问题。在这个小圈子里,耿济之和瞿秋白来自俄文专修馆,郑振铎来自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许地山和瞿菊农来自燕京大学。

这一年,即1918年,耿济之开始尝试从俄文直接翻译文学名著,他的第一篇译文是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耿译《旅客夜谭》),随后,他又译了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刊载在天津《大公报》上。同时,他还与郑振铎、瞿秋白等人一起为《新中国》撰稿。

据戈宝权先生回忆,耿济之曾对他说,《克莱采奏鸣曲》是用文言文翻译的。然而,1919年连载于《新中国》杂志的《旅客夜谭》,文体为白话文。这就是说,《克莱采奏鸣曲》的初稿是文言文,发表时,改写成了白话文!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节点,在此之前,翻译文学使用的文体,基本为文言文,在此之后,开始改为白话文。耿济之从事文学翻译的时间,大约在1918年他二十岁的时候,处于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的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旧文学转向新文学、文言文转向白话文的过渡时期。之后,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影响,耿济之始终坚持使用白话文翻译,是中国最早使用白话文、由俄文直接翻译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耿济之无疑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和先驱之一。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前一天,瞿秋白与耿济之代表俄文专修馆参加了北京学生联合会召开的会议。下午,他俩带着一堆彩纸和麦秸,回到万宝盖胡同的耿家,招呼弟弟

妹妹们一起糊小旗,写标语,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被胆小怕事的耿父斥责一番。然而第二天,在北京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下,耿济之与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郑振铎作为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代表,瞿菊农作为燕大的学生代表,共同参加了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以后又参加了抵制洋货的运动。

游行回来,耿济之的腿被军警打伤了,晚上发高烧,说胡话,什么打倒军阀卖国贼等等。耿母吓得直哭,耿父在一旁发脾气:“都是你养的好儿子,自作自受,叫他别去他偏要去!”事后,耿济之对大妹妹说:“一个人只要做得对,就不怕。爸爸脾气虽坏,但也是个中国人,也得爱自己的国家,没有国,哪有家?都像爸妈那样,不让自己的儿女出去游行,宣传真理,那些卖国贼把国卖了,我们都要当亡国奴了。”“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小我’看得太重,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家人的反对,军阀走狗的追捕殴打,都不能阻挡耿济之和他的朋友们投身学潮的行动,反而使得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统治阶级的本质,坚定了改造社会的信念。之后的两年里,他们创办进步刊物,发表针砭时弊的文章,翻译介绍外国进步文学,为科学民主立言,为人性解放立论,在改造旧中国的斗争中,发出了追求自由平等、建立和平幸福新社会的呐喊。

1918年秋天,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菊农等人,应基督教青年会——北京社会实进会^①的约请,成立了一个编辑部。1919年9月开始筹备创办《新社会》旬刊。1919年11月1日,《新社会》第一期出版发行,里面共收录了包括发刊词在内的

① 北京社会实进会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创办于1913年11月,由参加青年会夏令会活动的二百多名大、中学生组成,以“联合北京学界,从事社会服务,实行改良作风”为宗旨,下设学务、演说、游艺、调查、交际、编辑等部,开展各种相应的活动。

八篇文章。在《新社会》发刊词中,他们写道:“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所谓“德莫克拉西”,即英文“Democracy”的音译,意为“民主”,包括“民主制度和民主国家”。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德先生”,除此,还有一位“赛先生”(Science),即科学。

1919年9月,经历了“五四”运动的中国,表面恢复了平静,然而在广大知识分子心中,却翻滚着滔天巨浪。他们一方面延续着“五四”以来的批判精神,一方面更加积极探寻社会改造的出路,尤其是借鉴国外的思想和经验。这个时期,除了像《新青年》这样有影响的刊物外,全国先后出版的报刊达四百多种,足见当时知识分子思想之活跃,气氛之热烈。

就是这么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尽管学识不够,经验不足,但他们满腔热情,视改造社会为己任,不辞劳苦,白天上课,晚上写稿,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张晋等负责撰稿和编辑,郑振铎不仅写稿,还负责集稿、校对和跑印刷所。

《新社会》旬刊从1919年11月到1920年5月,半年时间共出版了十九期,自始至终以编辑部内部稿件为主,很少采用外部稿件,写来写去,总是他们几个人,这本刊物,几乎成了他们内部研究讨论、对外发表观点的专门阵地。

《新社会》名为刊物,实际上,前期只是一张十六开大小,四版篇幅的“报纸”。从第七期开始增加篇幅,扩至十二版,并且开始刊登广告,广告篇幅从最初的二版,逐渐增加到四版。按照常识,能够吸引广告投放,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刊物的社会影响。

《新社会》一经刊行,在社会上迅速引起广泛关注。《新青年》认为,“《新社会》是现在一个最具有进步最切实的杂志”。在出版

了两期之后,郑振铎与耿济之带着创刊号,拜访陈独秀。陈独秀对刊物大为赞赏,甚至建议他们更改体例,变作适合工商界阅读的通俗报纸。

《新社会》旬刊发行后,从最初的销售网点: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温州、日本等,后来又增加了吴淞、长沙,到被迫停刊前,其传播面可达四川、广西、广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边陲地区。可见其社会影响之大。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

我有如炬的眼,

我有思想如泉。

我有牺牲的精神,

我有自由不可捐。

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

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

我起!我起!

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

.....

《新社会》创刊号上,郑振铎这首气势豪迈的诗,写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满怀一腔热血,向旧世界及其统治者的威权宣战。

三 踌躇满怀的一年

1920年是耿济之人生中踌躇满怀的一年。这一年,他毕业进入外交部工作,相亲恋爱准备成家,在报纸杂志上连载译作,编辑出版译著,其翻译风格日臻成熟,开始进入丰产期。年底,他与郑振铎奔走运作,发起创立文学研究会……就其个人来说,可谓获益